

“胡武功事件”后的反思

何 娟

(河南博物院, 河南郑州, 450002)

摘要 本文通过“胡武功事件”，提出了一个修复行业应当引起重视的问题，即如何理解文物修复的原则，并在实践中如何把握文物修复的标准，以满足文物保护的需要和符合社会大众的审美心理。

关键词 事件 修复原则 审美心理

2016年5月5日晚，一篇名为《唐十八陵石人石马洗澡，千年包浆被清洗》的帖子，迅速引起网友们的热议。发帖人陕西省摄影家协会主席胡武功称：为了打造新景观，唐建陵和唐崇陵的文物部门将石人石马身上的千年包浆清除殆尽。

针对胡武功先生此文，陕西省文物局高度重视，当即就此事赴现场核实调查。经核实，此文反映问题不实，具体调查情况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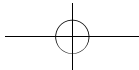
(1) 经陕西省文物局派人现场核查，该文所反映的唐建陵和唐崇陵石刻没有进行任何人为清洗，文物部门也未安排过任何清理工作。

(2) 该文所反映的唐建陵和唐崇陵“所有石人石马被清洗得干干净净”的现状是自然现象。其主要原因：一是1200多年来，唐建陵和唐崇陵石刻都处于一种自然保护状态，其外貌状况受自然环境因素影响很大，有的表层地衣苔藓明显，有的较少甚至不生长苔藓；二是石刻表面地衣苔藓的生长与石刻所处的微环境有很大的关系，迎风面基本上不生长地衣苔藓，反之，背风面易积尘，生长苔藓；三是近年来的空气污染，酸雨增加，导致石灰岩刻石的表面出现了一定的淋溶现象，造成了石刻表面泛白。

(3) 关于胡武功先生文中质疑“清除石人石马上那千年包浆”的问题，也是对专业名词的误解；石刻文物表层风化造成的有害病灶，并不等同于古玩的包浆，而是一种有害物质。针对这类病灶问题，在国内外专家的充分论证下，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文物局曾在唐乾陵（非唐建陵、唐崇陵）开展了探索性的石刻保护清理研究工作，但仅限于在唐乾陵选择的三件不同病灶类型的石刻进行科学保护清理。经10多年的观察，已保护过的三件石刻目前保护效果良好。

另外，国家文物局砖石文物保护研究基地负责人指出：在作者配发的7张照片中，举例的清洗前的图片，用的是乾陵无字碑碑首、东4石人像以及一个桥陵翼马的原状照片，而反映“洗澡”后效果的照片，用的是唐建陵和唐崇陵的照片，属于张冠李戴，不符合实际情况。

2016年5月7日，摄影家胡武功通过《法制晚报》发表公开声明，称多年来他坚持拍摄陕西省文物遗迹，发表看法是希望呼吁大家关注文物保护，这次事件中，他未能详细了解文物保护技术，造



成了不良影响，对文物部门表达歉意，事情到此告一段落。

通过这件事情，我们看到目前在这种信息爆炸的时代对于一些不了解的事情，即便是进行社会监督，反映情况也要进行调查研究；舆论监督要充分发挥其积极因素，要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更重要的是作为文物保护部门该怎样做，所做的文保教育和宣传是否跟上时代发展的要求，因此加大文物保护科普力度，向大众普及科学保护文物的技术措施，工作流程等已势在必行，这也是当前国家所倡导的“让博物馆‘活’起来，让文物‘活’起来”的重要内容。所以，这里就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向广大民众进行科普以及科普什么？就是如何理解文物修复的原则，并在实践中如何把握文物修复的标准，以满足文物保护的需要和符合社会大众的审美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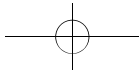
我们知道在文物修复行业的修复标准是“修旧如旧”。这个“旧”是指文物刚刚制造出时的原始状态呢？还是指文物出土时的那种状态？还是什么其他状态，目前修复界还有所争论，还有不同的理解。

20世纪80年代，文物保护的先行者将意大利现代修复理论和实践介绍到中国，其理论核心是：“修复是根据历史学、自然科学、美学、材料学的特征来认识艺术品，修复艺术品。”强调材料的可逆性、兼容性和可识别，充分认识科学发展的时代性，提倡给未来留下可工作的空间。

与此同时，在中国还有其他类型的修复。其中的一类，我们可以称作“古董”修复，主要体现在青铜器和瓷器修复、古书画装裱与修复等，它的目标就是使人不能辨认出何处为修补，何处为原状等，就拿青铜器修复来说，中国传统修复通过作旧保留了历史的沧桑感和文物的历史美感。但原始本体和补配的部位辨不出来。另外，还有一种修复，可称作“考古修复”，主要是考古工作者在考古发掘现场为尽快地获取考古资料，安排一些技工对陶器、青铜器进行修复的过程，这类修复在中国的历史并不是很长，它是随着现代考古学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以后，才逐渐发展起来的。它的重点是关注于器物的形状和完残程度。一件器物如陶器，如果能够找到它的口沿、腹部和底部，三者能够拼接起来，就认为是一件完整的器物，把它们黏接起来就行了，缺失的部分大面积地用白石膏进行填补，很少考虑它的美感和艺术性，只需要满足考古学上类型学的需要，能够进行分型排队就可以了。

因为存在着不同源流、不同技艺的修复实践，而且文物修复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文物修复出来的效果是千差万别。例如，重庆潼南大佛维修保护工程，最初设计的主要方法是仅回贴和补贴大佛表面的金箔，这么做可以尽可能地保留潼南大佛古旧的风貌，然而，在施工开始后，修复者发现，仅作局部回贴和全色，整体上仍会出现斑驳的外观，无法满足礼佛的宗教需求，因此，修复者在进行了严格的前期科学实验前提下，使用整体的髹漆贴金传统工艺对大佛进行了修复。修复后的大佛给人以金光闪闪、富丽堂皇的整体观感。虽然有一部分认为修新太新，丧失了一定的历史风貌，但有些人认为，给大佛重塑金身本来就是一种传统的保护修复方式，在历史上，潼南大佛曾经经历了多次髹漆贴金，仅年代较近的记载就有1802年、1872年和1921年三次，这种行为本身就具有历史的延续性，代表着一种文化传统，潼南大佛的保护修复工程正是回应了这种传统。此工程得到了当地政府、信众和普通民众的广泛认同。

1980年发现的秦陵铜车马——一组两乘大型铜车马。经历8年，修复工作者运用除锈、矫形、补配、黏接、焊接作旧彩绘等工艺，成功地给予修复，再现了其昔日的风姿。国家文物局鉴定委员会的鉴定意见认为：“本项目修复方案科学、合理、可行、技术资料齐全、实验数据可靠。本项目将传统修复技术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在修复工艺设计和修复技术方面有所创新，在大型青铜文物



修复领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具有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同样，1992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柬埔寨吴哥窟，近百年来，世界各国投入了大量资金进行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在众多的维修工程中，很少有改变其外貌的，无论是缠绕古庙的千年大树，还是从缝隙中挣扎而出的杂草，或是石窟上遗留下来的千年黑色尘积都不作清理，甚至是一些残垣断壁也不作修补，尽量保留其历史沧桑感，追寻历史的古迹，美丽苍冷中带着淡淡的哀愁，令人着迷。然而，也有对吴哥窟古迹进行修补的，如中国负责修复的周萨神庙，修复前几乎是一片废墟，原有的9座单体建筑中除西塔门保存较好之外，其余8座完全损毁。垮落下来的石块堆积散乱，40%的塌落构件已风化、破碎或丢失。中国文物保护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总结出自己的一套保护原则——抢险加固、原址保护和重点修复。抢险加固是在基本保持现状的前提下进行的一般性保护工程；原址保护是坚持尽可能多地使用原构件；重点修复是对于神庙遗失的石材，工程队从吴哥建筑石材的原产地荔枝山运回来，经过浅加工，放入神庙的重建部件内。同时为将来可变更的修复方案留有余地，对于那些缺失和不能恢复但又必不可少的建筑基座、墙体不得不用新砂岩代替，但后补的石墩石柱窗台门楣都不作雕刻，以此作为与古迹之间的区别。这种修复原则得到东方的充分肯定。

因此，在此并不是要讨论哪种修复优劣问题，而是要认识到在修复文物时遵循的文物修复的基本原则，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来进行修复，即保护原则：①不改变文物原状，②整体保护原则，③科技保护与文物相结合的原则；修复原则：①最小干预原则，②可逆性原则，③可识别性原则。

现在许多考古工地在修复时，已经改变了大面积用白石膏补配的方法，开始在石膏中加入矿物颜料，使补配部分与原始部分颜色相近或相似。在传统修复中，尤其是大型的文物机构，如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等，开始借助于X射线和其他科技手段全面地对文物进行检测，并留有详尽的修复档案，避免了补配部分和原始部位分辨不清的问题。随着一些大学开设了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一些具有现代修复理念和技术的人员，分配到各大文博机构，并成为“挑大梁”式的人物，现代修复的理念越来越成为一种流行趋势。

总之，各种修复技艺各有所长，应该在保留其技术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地取长补短，互相吸收，共同进步。所以，对一件文物修复效果的好与坏，其外表并不是我们判断的唯一标准或主要标准，而应该看在修复时是否遵循了文物修复的基本原则，是否体现了文物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是否能使文物“延年益寿”，还要体现文物的社会价值，体现公众心理需求。例如，修复师在修复美国的历史古城威廉斯堡时宣称，他们充分认识到了历史真实性的重要性，并将把威廉斯堡真实还原到1776年。但是，为了照顾黑人族群的情绪，他们还是毫不犹豫地全面拆除了威廉斯堡中原本用于贩卖黑奴的市场以及黑人奴隶原来的居所。

以上是对“胡武功事件”的一点反思，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思考。